（上接13版）

所一事，我写了几百字，指出此事所以引起谈话会的建议，实因‘中研院’筹办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得史语所同仁的支持与合作，是最不幸的事。此信很不好写，写了恰好李济之来辞行，我请他看了才发出。济之说，‘先生若不说，谁肯说？’”此即同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召开的北美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第一次谈话会后，围绕任命郭廷以建立近史所筹备处所引发的争议及胡适的态度。胡适于1957年7月20日致赵元任信亦谓：

“中研院”新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备处主任郭廷以，最好能够出来走走。但我不知道他的学历。

虽均是诚恳之词，对事不对人，但皆可想见胡适对郭廷以的隔膜及不甚了解。而胡适回来执掌“中研院”，更被近史所普遍看作不妙的兆头。如李国祁《忆量宇师》文即谓：

此时近史所的外在形势已与过去大不相同。一方面打开了与美国大学合作之门，华盛顿大学合作计划之后，进一步与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展开合作，日后并在费正清（John K. Fairbank）大力支持下，取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长期资助。在外，近史所声誉日隆，远景宏大。当然因此引起本地反对人士的忌妒与眼红。而本地的情况亦产生若干不利于郭师的变化，那就是在一个星期六下午，蒋介石突然来到“中央研究院”，研究院因事先未获通知，无任何准备与接洽，令他颇为震怒。朱家骅因而去职，改由胡适之先生接掌“中央研究院”。觊觎近史所者在胡先生身边进谗，量宇师原来与胡适之先生渊源即不深，而今则关系大坏。日后竟发生郭师被迫上辞呈，胡院长欲加以批准（或云业已批准，只是尚未公布而已），使近史所再度陷入危机，量宇师的事业有因此斷断的可能。（陈三井主编《走过忧患的岁月：近史所的故事》，台北：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，1996年2月）

揆诸当日台北学界派系分野及彼此间人情，胡适向郭廷以推荐金承艺的胜算实不算大，但竟至成功，且效率如此之高，当是胡、郭两位先生皆出之于公，而郭廷以引进人才不拘一格所致。如李国祁即曾评价他的老师说：“郭师用人门户之见并不深，在研究工作方面，除了他的学生外，亦用了不少他校他系毕业生。在助理员这个阶层中即是师大与台大的毕业生。”（同前引，35-36页）王萍女士在2003年8月18日接受沈怀玉访谈时亦说：“他（按指郭廷以先生）不仅只是对自己的徒弟，无论是台大、师大或其他学校毕业的，他都当做自己的学生看待，不分彼此。虽然我不敢称呼他老师，但在我心目中他已经是我研究上、学术讨论会上的老师了。……魏廷朝当年是晚上在单身宿舍被抓走的，……其他例如王世流、金承艺等，都深受白色恐怖之害，也让近史所流失不少优秀的人才。所以回想起来，郭先生的胆子还真大，象是金承艺，人家不敢用的，他都敢用；还有吕士朋，他被关出监狱后，郭所长还是让他到近史所工作。”

而在此之前，胡适亦曾向史语所所长李济推荐过金承艺，但没有成功。王尔敏《交友当交金承艺》文云：“我与承艺相识很晚，是在一九六一年间。他因结束编辑工作，而暂到‘中央研究院’，基本上他想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清史研究，但凭院长胡适的引介，也不能成功，倒是顺利的受到郭廷以所长的邀聘，进入近代史研究所，职位与我相同，做助理研究员。……承艺治学，专攻清史，并无意于近代史，以其北大出身传统背景，他是极想归于北大一系傅斯年旗下之史语所，不知何故，凭胡适院长推介，亦未能成功。他不得已承郭廷以所长之招，而进入近代史所。”（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一〇〇卷，第四期，55页、57-58页）

安平贝勒杜度。承艺一支是杜度的嫡直后人。杜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孙，广略贝勒褚英的长子，是清入关前建功至伟的几位骁将之一。

清末辽东中日军方谈判照。照片右侧为辅国将军副都统德裕，后立着侍从管事胡善同，左侧二人是日本代表，后立者为日军翻译。

承艺先生入近史所后，一方面参与所里的安排，确定研究方向，并参与郭廷以安排的具体工作；同时，亦不时到胡适处帮忙，接受着意的训练。其在近史所的状况，郭廷以日记尝记如下：

［1961年10月28日（九月十九），星期六］……又夷务始末分类目录由金承艺整理，准备出版。

［1961年11月10日（十月初三），星期五］复福特基金会函已由胡适之先生签字发出。邀王萍、王聿均、李毓澍、金承艺、吕实强、李念萱诸君商五年计划准备事项（咨询会章则，第一年预算，发布新闻）。王世流君闻已被判刑，决由近史所同人设法济其家用。

［1961年11月14日（十月初七），星期五］近史所讨论会，金承艺君讲同治帝建储问题。

［1961年11月16日（十月初九），星期四］商讨福特补助计划有关章则，由王萍、李毓澍、金承艺等起草。

［1961年12月23日（十一月十六），星期六］与王聿君、金承艺、王尔敏、李念萱商讨专题研究大纲。……

从以上材料看，金承艺当日在近史所，亦蒙郭廷以看重，委以重任。近史所讨论会上，金承艺所作“同治帝建储问题”，当即是他后来《关于同治帝遗诏立载澍为帝一事的辩正》一文的雏型。而每两周一次的讨论会，被当日的同人认为是近史所自成立以后的一大特色，如王萍女士即谓：“近史所两个礼拜召开一次的学术讨论会，是创所以来持之以恒的传统，讨论会中个人所发表的文章，经过同仁之间的交叉讨论、甚至批评，把毛病都挑出来了，修正后再发表，大家受益很多。当时在讨论会上同仁们互相评论之外，最后一定是郭先生作结论，他的结论之精彩，简直让每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无论是军事、社会或边疆等问题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而且为我们所作的评论或结论，几乎是一针见血，令人茅塞顿开，让我们对每一种题目都有不同的收获。”（陈仪深等访问、王景玲等记录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台北：“中研院”近史所，2004年，130-132页）相信金承艺也曾受到郭廷以的评介及提点。金承艺自近史所辞职抵澳洲后，亦不时有信给郭廷以，如郭氏日记1964年9月8日记云：“金承艺自澳洲来信，告近况，工作亦勤。”同年12月7日复记：“金承艺来信，颇多赞美之词，并寄文稿。”从郭氏日记中的所记看，金承艺当对郭廷以有一重感恩及倚为长者的情愫在焉。

王尔敏《交友当交金承艺》曾说：“承艺是名校北京大学出身，备受胡适院长垂爱，也与哲学家殷海光有来往，却从来不作一毫标榜，更不作妄自吹嘘。……他的秉赋性格，我最为欣赏，可以说是坦诚开朗，纯真亲和，率性潇洒。”（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一〇〇卷，第四期，56页）但因北大出身及经由胡适所荐而来的情形，金承艺多少被孤立自是难免的事，所中不少同人更是将他视作胡适安插到近史所的一个“坐探”。如王文即言：“承艺是正人君子，到了近代史所，也是认定其治学归宿，丝毫未存有北大旧门系姿态，立身行事，以近代所为立场，我是十分信任他，并结为好友，近代史所同仁，以其到所不久，来去匆匆，好像绝袂而去，原是有人怀疑他独来独往，心不在近代史所。此点我以人格保证，支持承艺的做人高洁正派。”（同上引，58页）正话反听，可以想见金承艺彼时在台湾近史所，多少是受到猜忌的。而1961年底、1962年的郭廷以辞职风波，更是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。

金承艺先生与父母合影，1930年代初摄于北平。前排左起：母亲恒太夫人、妹妹庄梅、父亲广泰先生；后排左起：四弟金承增、三弟金承涛、大姐庄菊、大哥金承藻、金承艺、表弟喜塔腊氏后裔。

墨尔本大学中文系于1960年成立，金承艺被延揽前去任教。

本文所有照片，蒙金承涛先生提供，特致谢忱！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）